

【書評】 Book Reviews

李零：《入山與出塞》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

李修平*

一、前言

《入山與出塞》一書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李零先生於二〇〇四年出版的論文選集，除了〈自序〉與〈後記〉外，全書共收錄了二十九篇文章，分為「寫在前面的話」、「翁仲研究」、「有翼神獸研究」、「早期藝術中的宇宙模式」、「早期藝術中的神物圖像」、「浙川楚墓研究」、「楚國銅器研究」與「讀書偶記」八大部分，探討的課題牽涉廣泛且豐富多元。文章內容多由考古遺物遺跡入手，結合歷史學、藝術史與古文獻學等研究取徑，重新審視中國上古史中，所謂「中國文化」或「華夏文化」形成與發展的軌跡。

李零的年輕時代，曾歷經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當年的他僅受過中學教育，在狂潮漸歇之後，李零決定重拾書本，進入中國社科院考古系研究古文字學。身為一位考古學系的學生，他曾經兩度親下田野，參與考古遺址的挖掘。但應是醉心古文字學的魅力，他還是決定將對學術的熱情，投注於古文獻學的研究，放棄了與「土」打交道的考古學。雖然古文字學與古文獻學是他的專門研究領域，但考古學的背景與訓練，始終在李零的學術研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大量使用考古材料並結合各種不同學門的研究方式，便成為他治學的特點。《入山與出塞》就是這樣的一本論文選集。

二、尋幽探密：簡介《入山與出塞》

(一) 入山與出塞

* 作者為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本書名為《入山與出塞》，開宗明義即表明作者欲從「入山」與「出塞」兩個角度出發，解釋中國上古文明演變的特色。在全書首篇〈入山與出塞〉一文中，作者大略敘述他近來關注的兩個研究課題：中國古代的祭祀遺址，以及考古發現的外來影響（頁3、10）。前者（入山）強調中國在上古時代，早已發展出自身獨樹一格的文明特色；後者（出塞）則論述遠古時期中外（華夏與蠻夷、中原與境外、東方與西方）交通與相互影響的關係。研究方式則是考察出土文物的型制與藝術表現的手法，從中尋繹外來文化對「古代中國」文化的影響。

中國現代的考古學肇興於二十世紀初年。隨著各地考古遺址的發現，大量的先民遺物於焉重現天日，為中國的史學界帶來空前的震撼。但由於技術與觀念的不成熟，早期的考古發掘，一方面著重於古代城邑與相關的聚落，忽略位於名山大川的「祭祀」遺址，另一方面則注重發掘出來的「物」，而非保存器物的「坑」（或遺址）（頁3）。這樣的現象，導致研究者對於遺物遺跡誤判，無法真正看清古代中國文化的面貌。《左傳·成公十三年》：「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短短的八個字，直截明瞭地指出了祭祀與戰爭在古代中國的重要地位，然而囿於後人之見，學者往往多研究古代的戰爭史，關於古代宗教與祭祀活動著墨不多，這是值得檢討並進行深入研究的課題。〈說「祭壇」和「祭祀坑」〉便是針對中國古代的祭祀遺址，進行初步綜合性的討論與相關概念的釐清。一方面，作者整理傳統文獻中關於「祭壇」及「祭祀坑」的記載，從文獻中考證祭祀活動的場域名稱與功能，另外，李零還收集「祭壇」及「祭祀坑」的考古報告，配合文獻資料，解釋「祭壇」即古書中的「壇」、「墀」或「場」（頁17-20）；¹「祭祀坑」即古書中的「瘞坎」，其中埋藏的物品具備特殊的宗教目的。結合出土文物與文獻資料，李零嘗試為古代中國的祭祀活動，勾勒出一幅帶有文化意義的歷史圖像。

除了對祭祀遺址進行考察外，本書著重的另一個焦點則為考古文物中潛藏的外來影響。隨著中國「邊緣地區」考古文物的出土，以及對古代北亞草原文化的研究，再加上對遠古時代其他文明特色的比較，綜合觀之，這些不

1 關於「壇」、「墀」及「場」三字，雖然都帶有舉辦祭祀活動場域的意思，亦經常穿插使用，但其中仍有不同的意義。

同的資料與研究成果，似乎都隱約透露著其實早在數千年前，「東西」的文明已經發生所謂的文化交流。對於學者來說，若僅是研究上古時期中國境內的遺跡遺物，我們很難看出「中外」文化交流的趨勢與影響。當然，遠古時代，尤其是在文字發明以前，沒有任何的文獻記載來直接證實「東西」或「中外」文化之間的相互關係，但若從出土器物的型制以及藝術的表現手法，並設法探究其背後所可能蘊含的意義，或許還是可以發現外來因子對上古中國文化的影響。李零在爬梳大量的考古資料後，分別從古代遺留下來的翁仲、天祿辟邪、獅子及其他非「中國」原產的動物器物造型與紋飾，來推測「周邊地區」對「華夏地區」的影響。

所謂的翁仲，原本指的是匈奴的祭天神像，大約在秦漢時代就被漢人引入中國，當作宮殿的裝飾物。初為銅製，號曰「金人」、「銅人」、「金狄」、「長狄」、「遐狄」，但後來卻專指陵墓前面及神道兩側的文武官員石像（頁41），成為中國兩千年來上層社會墓葬及祭祀活動重要的代表物件。除了人像外，還包括不同動物及瑞獸造型的石像。關於古代巨型石人的分佈範圍，若將焦點從中國境內轉移至整個歐亞大陸，我們可以發現，其實整個歐亞草原（Eurasia steppes），都有與中國類似的「墓地石人」，而且材料眾多。這樣的發現可以說明，自新石器晚期（西元前三千年左右）以來，巨型石人文化已經逐漸在歐亞大陸各地蔓延，雖然各地的石人特色不盡相同，但石人雕刻的流行卻具有普遍性（頁72-80）。

大型石人雕像在中國傳布的起源雖然充滿域外色彩，但有翼神獸與非本土動物造型藝術的發展，卻是另一支更值得注意的文化交流現象。有翼神獸在古代文物中是一種使用材料豐富、時間流行極長的藝術主題。就考古發現而論，中國境內有翼神獸造型的出現可上溯至戰國時代，大量出土的銅器、陶器、玉器、石器與金銀器，都以有翼神獸為主題，而且還出現在許多不同器物的紋飾上。傳統文獻中，麒麟、天祿、辟邪、天祿蝦蟆與飛廉可算是有翼神獸的典型代表（頁87-117）。除了有翼神獸外，獅子在中國成為非常流行的藝術題材，可算是另一個相當有趣的研究課題。獅子並非原生於中國的動物，而早期獅子造型傳入中國，便和上述有翼神獸進入中國有密切的關係（頁130-131、145-147）。在西亞、中亞與歐亞草原一代，有翼神獸是一種流

傳甚廣，並且發源極早的藝術主題，格里芬（griffin）造型的藝術品為最典型的代表。雖然在不同的時代與區域間造型各有特色，但「帶翼」則為其重要的共同特徵（頁117-128）。²李零認為，不論從文獻或從文物的形象來看，中國的有翼神獸都與中亞、西亞與歐亞草原的藝術有著不解之緣。另外，中國流行這類主題的時代，亦較上述地區來得晚，而且中國境內早期發現的有翼神獸文物，都帶有較濃厚的外來色彩。再者，雖然中國的有翼神獸出土地點極多，但早期仍集中在黃河流域，尤其是與西域相鄰的今甘、陝、晉、冀四省，然而在長江流域甚至長江流域以南，亦發現不少有翼神獸的文物。古代「中國」境內地域文化的交流傳布，可見一斑。最後，李零認為中國的有翼神獸雖受到外來的影響，但它們卻與中國原生的藝術主題長期共存，甚至相互影響，兩者處於一種互動的狀態（頁132-133）。文化影響並非僅是單向傳播，更重要的是彼此相互的融合，進而萌發出新的生命力。

（二）藝術表現、楚國研究及其他

出土文物配合傳統文獻的研究，是李零治學最主要的特色。除了上述兩大主題「入山」與「出塞」外，作者在本書中所收錄的文章，還涉及了中國早期藝術中宇宙模式與神物形象的探討，以及對南方楚國墓葬與銅器的研究。

一九九三年李零出版了《中國方術考》，二〇〇〇年又出版了《中國方術續考》，這兩本書的出版，無疑說明了李零對於中國古代數術與方技濃厚的興趣。在《中國方術考》中，李零曾花了一整章的篇幅，討論「式」與中國古代的宇宙模式。³所謂的式，是古代數術家占驗時日的一種工具，作者認為，「這種器物雖方不盈尺，但重要性卻很大，對理解古人心目中的宇宙模式乃至他們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是一把寶貴的鑰匙。」⁴在《入山與出塞》

2 若探究這類有翼神獸的造型，其實仍有許多明顯的差異。若以亞述、波斯與中亞地區為例，約在西元前九至四世紀，大略就可以分為鷹首或鳥首格里芬、獅首格里芬或帶翼獅，以及羊首格里芬或帶翼羊。另外，其實因著地域與時代性的不同，有翼神獸的還有許多不同的分類方式。

3 李零：〈式與中國古代的宇宙模式〉，《中國方術考（修訂本）》（北京：東方出版社，2001年），頁89-176。

4 同註3，頁89。

中，作者承繼原本研究的興趣，收錄了四篇討論中國早期藝術中宇宙模式的文章。這四篇文章的內容，除了〈跋石版村「式圖」鏡〉與〈跋中山王墓出土的六博棋局〉兩篇文章（頁171-186），依循由式的觀點討論早期中國人的宇宙觀，可視為《中國方術考》的餘緒之外，〈楚漢墓葬中的帛畫和中國壁畫墓的起源〉與〈說漢陽陵「羅經石」遺址的建築設計〉，則分別從繪畫藝術與建築的角度，解釋早期「中國人」對於外在世界宇宙模式的認識（頁165-170、187-200）。雖然使用的材料與研究方式與前面兩篇文章及《中國方術考》不同，但卻有互相補充的效果。

關於中國早期藝術中的神物形象研究，李零從馬王堆帛書的「神祇圖」、湖北荊門漳河車橋戰國墓出土的「兵避太歲」戈、河南輝縣琉璃閣發現的兩件銅壺紋飾，加上曾侯乙墓棺飾上的神物及其他的出土文物及紋飾為材料，說明這些神物圖像在表現手法上都具備相類似的特徵（頁203-220）。對於這些造型相似的主題，以往並沒有受到研究者的重視，但李零認為，這些神物圖像應該反映了古代中國部分的宗教觀，值得學者深入研究。關於馬王堆的「神祇圖」與湖北荊門的「兵避太歲」戈，李零認為或可稱其中的神物為「太一」，即天神之意（頁206）。另有一說，則認為「太一」是古代星神之尊者，所居之處為天極，代表宇宙中心。漢代極重視「太一」，在天文學史和思想史上都具有重大的意義，只是長期以來，「太一」真正的意涵為何，卻一直混沌不明（頁211-212）。若我們要對中國古代的思想與世界觀有更深入的認識，對「太一」的研究將提供我們另一條不同的思考取徑。

大批材料的出土，使得楚地研究成為近年來中國考古學界風行一時的題目。從史學的觀點來看，原本排除於華夏之外的南方楚國，隨著東周以降歷史局勢的演變，與西方的秦國漸漸都匯流入華夏文化圈中，成為其中的一份子。這種「華夏化」或「中國化」的過程，是個相當引人入勝的課題。楚地相對於中原，位於外圍地帶，從出土的文物中我們可以發現，雖然保有濃厚的地方色彩，但是其中卻可看到許多受到中原文化影響的成分。中原文化對楚地的影響，最顯而易見的，就是表現於該地出土的青銅器。對李零來說，青銅器型制的分類方式是他最關心的課題。

傳統的青銅器分類方式，多依照宋代以來分類法，即將類似型制的器物歸為同類。但李零以為這種分類方式帶有嚴重的缺陷，因為不能僅將相同器型的物品視為同類，還必須清楚地掌握青銅器型制的演變才行，否則就可能發生將茶缸與筆筒並排的可笑狀況。李零認為，我們對於青銅器器型演變的認識，必須「兼顧銘文、器型、組合、功能，上下左右，融會貫通，才能理出頭緒。」（頁247）他所採取的方法，與一般分析銅器紋飾及風格的方式相當不同。簡而言之，就是以青銅銘文的研究為基礎，尤其是所謂「自名器」（即青銅器上已鑄刻有該器物的名稱）的研究，再配合傳世文獻的知識，對青銅器的分類重新訂定規則（頁272-273）。這樣大膽的嘗試，對於長年從事青銅器型與紋飾的研究者來說，無疑帶來空前的挑戰。

但若要對青銅器的分類方式重新定義，那為何挑選楚地的青銅器來作為研究對象？李零認為，雖然從考古學研究上，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北方與南方文化有著顯著的差異，但在當時六個南方文化系統中（頁275），⁵楚與諸夏間的關係最為密切，因為它處於南方的地位，正似周在北方的位置，同樣都位於天下中央。周、楚都是天下輻湊的文化中心，而且周南與楚北彼此相互重疊，文化往來頻繁，這是客觀的地理條件因素。如果過份強調楚文化的地方特性，反而會帶來許多誤解（頁275）。因此，透過楚地發掘出來的青銅器，李零試圖重構了一套青銅器的分類方式（頁234-238、242-244、247-342）。

本書的最後一部分為作者的讀書隨筆，收錄了七篇與前面討論問題間接相關但篇幅較小的文章。除了延續前文的基調討論出土文物的器型外，最有趣的還是對於器物上紋飾的分析。除了再次強調中國古代文化的外來影響外，在〈中國的水陸攻戰圖和亞述的水陸攻戰圖〉及〈格魯吉亞青銅帶飾上的鳥首羽人〉中，採取比較的觀點，將異質文明區域但卻具備相似的藝術表現題材，搭建跨越時空對話的舞台。比較的視野，是作者在本書中另一個不斷反覆強調的研究方式。

5 所謂六個南方文化系統，除了楚之外，還包括吳越、徐及群舒淮夷、巴蜀、滇以及最南方的百越等五個地域。

三、小結與短評

《入山與出塞》乃是一本論文集式的作品，雖然乍看之下，作者選擇的文章與討論題材十分繁雜，而且探討的範圍還不僅限於「入山」與「出塞」，讓讀者如同身陷五里霧中，一時間難以掌握作者的中心論旨，但在細讀全書後，我們還是可以在不同文章的字裡行間，隱約嗅出李零對於中國上古史研究的基本觀點與思考脈絡。

簡單地說，當然，新石器時代以降的「中國」（這裡指的是地理區域，而非政治實體），雖然各地域間發展出風格迥異的文化系統，但這些文化並非單純而獨立地發展，它們是相互交流與影響的。就全局而論，雖說區域間的差異極大，但在這塊神州大陸上，此時卻已逐漸顯露出所謂「中國」特色的文化趨勢。張光直曾以「交互作用圈」及「地域共同傳統」的概念，解釋中國遠古時代區域文化與「中國」文化的關係。⁶這種觀點與李零的想法若合符節，或許李零是受了張氏的影響也未可知。

再者，所謂的「中國」文化，其實在大一統帝國形成之前，乃至於夏商周三代以前，早已與所謂的「邊緣」或「域外」地區，以及各式不同的文化進行廣泛的交流。這種情形幾乎無法/沒有筆之於書，大多隱而不顯，埋沒於荒煙漫草之中，研究者只能靠出土的考古遺跡與文物，找尋外來文化影響的痕跡。李零一方面認同「中國」文化本有的獨特性，但在另一方面，卻也同時承認上古的「中國」文化，早已具備外來因子。這種對於中國上古文化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概念，當是李零長期浸淫於考古文物與文獻材料研究所得到的心得。打破疆域與國境的態度，發掘不同的材料來探究中國上古社會的內涵，對於今日有心於研究中國上古史的人來說，確實另闢蹊徑，提供了一個較為寬廣的視野。

6 約瑟夫·考德威爾（Joseph R. Caldwell）提出的「交互作用圈」（interaction sphere）與班內特（W. C. Bennett）提出的「地域共同傳統」（area co-tradition）兩種理論，張光直認為兩者概念相同。張氏以為，在同一個地域內，包含許多不同的區域性文化，這些文化互相交流，對整體地域文化特徵的形成具有深遠的影響。上述兩種理論，都是在發揮這種地域文化交流的概念。而中國上古區域文化間的交流與對整個「中國」文化的影響，亦可做如是觀。張光直：《考古學專題六講》（臺北：稻香文化事業，1999年），頁47-52。

若以歷史學的角度審視《入山與出塞》，雖然作者在書中並沒有特意突出史學研究的傾向（當然這也並非作者的初衷），而是以考古學、古文獻學、古文字學、藝術史、人類學、文化傳播與文化比較的觀點，來論證他心目中上古中國的文化系統與社會模式，但這種論述方式卻不斷地迫使讀者，尤其是對中國上古史乃至人類早期文明發展史有興趣的人，對遠古世界歷史的研究取徑進行全面的檢討。我們可以從概念、材料與方法三個層次，來思考這個問題。

就概念上來說，歷史研究，尤其是上古史的研究，我們必須跳脫當代「國家版圖」概念的窠臼。所謂的「國家」是西方世界文明發展的產物，與中國原有「國」乃至「天下」的概念，有相當程度上的差異。「國」與「天下」是三代以降（尤其是西周以後）逐漸發展出來的觀念，隨著時代的更迭，兩者蘊含的意義亦與時俱變，但卻從未發展出與近代西方嚴格意義上與「國家」一詞相似的概念。若再將時代往前推移，回溯到遠古的石器時代，關於人類早期歷史的演變，我們僅能說，不同地區的「人類社群組織」，發展出型態各異的文化與生活方式，他們彼此間以各種方式（包括物資交換、婚姻、戰爭等）交互影響。如果我們真的想要探究遠古時代的歷史，但卻將自己侷限於當今「國家版圖」的疆域限制內，無疑是劃地自限，無法真正看清早期人類文明發展的軌跡。

就材料上而論，研究歷史，當然文獻材料相當重要，而這也是史學研究的基礎，但對於上古史研究來說，僅是依憑文字史料是不足的。一方面在文字發明之前，遑論有所謂的文獻材料，即便是發明了文字，能僥倖歷經天災人禍，超越千年而流傳至今的，僅是滄海中的一粟，加上古文字解讀的不易與運用的問題，在在都使得僅是想靠文字史料來研究中國上古史，是件極為困難的事。所以就實際研究的情況上來說，必須利用大量出土的考古文物與遺址，配合有限的文字材料，重建古代人類生活的各個面向。王國維曾說過：「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

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使得爲之。」⁷文字與考古資料的相互配合，是上古史研究必須反覆琢磨的問題。

從方法上省思，中國上古史的研究方式，尤其是對文獻難徵的時代，若想要探究人類文明的起源與演變，就勢必藉由許多不同學門的協助，才有可能對古代人類的生活甚至思考模式有進一步的認識。《入山與出塞》對於遠古中國文化的研究方法，如前所述，採用了考古學、古文獻學、古文字學、藝術史、人類學與文化研究的方式，進行綜合性的論述；李宗侗所寫的《中國古代社會史》，則受到法國社會人類學家古朗士（N. Fustel de Coulanges）的影響，將人類學中圖騰、祀火等概念，運用在中國上古社會結構的詮釋；⁸而當代生物演化學家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在《槍炮·病菌與鋼鐵》中，更是兼採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的研究成果，包括考古學、人類學、民族學、語言學、地理學、生物演化學與流行病理學等學門，企圖跳脫傳統史學的角度，建構一套人類文明發展的「大歷史」。⁹雖然各家討論的對象不同，使用方法各異，內容各有所重，但是不同的研究取徑，確實能使我們大開眼界，讓有志研究上古史的人能有機會深入思考，該用什麼樣的態度及方式，來研究古代的社會與歷史。以歷史研究的方法爲基礎，輔以適當的研究學門，將爲上古史研究帶來新的契機。

當然，《入山與出塞》仍有些美中不足之處。就體例上來說，由於本書是李零的論文選集，雖然其中收錄的文章大多與考古美術有關，作者亦事先將收錄的文章分成八大類，但初讀該書，仍嫌不易清楚掌握全書的脈絡。所幸文章極具可讀性，內容引人入勝，對讀者來說可稍微抒解心中的困惑。其次，就文章的內容而論，或許是因爲文章均爲論文的關係，礙於篇幅，所以有時候作者在論述某些概念時，僅將相關或相對的意見略微提出，或者甚至直接省去不談，對於一般的讀者來說，很容易陷入作者獨創新說，而成爲一家之言的感覺。作者應當在文章中對相左的論述提出清晰的論證。

7 王國維：《古史新證——王國維最後的講義》（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年），頁2。

8 李宗侗：《中國古代社會史》（臺北：中國文化大學，1954年）。

9 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著，王道還、廖月娟譯：《槍炮、病菌與鋼鐵》（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1998年）。

綜觀《入山與出塞》一書，雖然它並非是一本嚴格意義上的歷史研究書籍，但是在李零的文章中，卻反映出許多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與探索的問題。就內容而論，中國古代的祭祀遺址與考古發現的外來影響，是值得研究者投注心力探討的實際課題，一方面進一步深掘「中國」文化的特殊性，同時亦關注「中國」的境內與域外，異質文化的互動與傳播的關係。再者，就李零研究的方法來說，他採取了各種不同學門的取徑來研究中國古代文化，這種寬廣與開闊的心胸，對於有志於中國上古史研究的人來說，無異是廣開門路，使得上古史的研究能夠更加的豐富與生動。雖以傳統文獻為本，但卻進而超越傳統文獻的限制。張光直先生曾說：「三代的研究是沒有學科的。」¹⁰或許我們可以更動幾個字：歷史的研究，尤其是上古史的研究，是沒有學科的。這是我心目中的史學。

10 李永迪：〈與張光直先生談夏文化考古〉，收於北京三聯書局（編），《四海為家：追念考古學家張光直》（北京：三聯書局，2002年），頁177-187。